“致力于实现两岸统一的‘神圣使命’”

——外国政要和媒体眼中的习近平

□ 本报特约记者 柯 岩

2015年11月6日，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刊文报道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面时说，两岸统一是历代中国领导人的夙愿，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习近平是中国领导人中使中国最接近这个目标的人，而“习马会”是向着这个目标迈出的“一大步”。《华尔街日报》评论则称，“习马会”将为未来两岸领导人对话奠定基础，也表明习近平致力于实现两岸统一的“神圣使命”。

“‘习式风格’在两岸关系中的一次精彩上演”

韩国《中央日报》报道称，随着此次“划时代”会面的到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新加坡。韩国MToday新闻网站称，“习马会”是一次彰显智慧和勇气的会晤，更是一次历史性的事件。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此次握手将引起海峡两岸重大回响。英国《金融时报》用“历史性”一词评价“习马会”，说：“在外界眼中，这又一次显示了习近平往往难以预测的领导风格。他是发出多重信号的高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习马会”备受国际瞩目，欧盟对外事务部认为这次会面将是充满希望的一步，欧盟也会持续关注。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塔夫罗夫斯基教授认为，会面选择的时机显示了中国人特有的智慧。

新加坡《联合早报》8日报道称，“习马会”成为全球最为瞩目的焦点，极具画面感、仪式感的握手，中间交集着历史进程中多少苦难、辛酸、痛楚以及角力，非亲眼见证而不能想象。分析指出，打破僵局需要政治智慧和文化底蕴。两岸问题中，借助于历史的积累和中华文化的深厚内涵，通过词汇背后的含义，汲取丰富营养和智慧，找到化解纠结的表述，而为彼此所接受。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9日就此发表社论称，两岸经历了从海协会、海基会的半官方接触，到国台办和陆委会的官方接触，再到两岸领导人的历史性会面，反映的是台海和平与稳定的大趋势。这期间固然因为台湾政治发展以及国际大势等因素，一度出现反复，但基本上并未全然颠覆双方寻求合作的政治意愿。这当中的能动性，主要来自越来越有自信的北京，选择以相对开放的姿态，顾及台湾就对等和有尊严的交流的要求，才可能促进双方关系保持和平发展的主旋律。大陆这回采取主动，让“习马会”得以实现，颇能反映北京在这方面的灵活性。社论称，两岸双方都必须做出一些妥协，才可能达到领导人历史性的见面，从现实层面而言，大陆所体现的“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的智慧，无疑是其中关键。虽然两岸事务性质上属于“家庭事务”，但北京选择在新加坡展现对台湾的善意，也间接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以大事小”的能力。

英国《金融时报》11月10日发表题为《“习马会”加大台海两岸引力》的报道称，“此次会晤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它表明，习近平是一位多么强大和果断的领导人”。

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评论说，“习马会”显示习近平有意寻找更创新的方式释放善意。美国《侨报》11月7日社论文章报道说，“习马会”双方的共识之多，令人惊喜。对于这样一次会晤，要从民族和世界的高度去观察、去评价。“习马会”同时也是“习式风格”在两岸关系中的一次精彩上演。习近平不背包袱，勇于担当，对两岸问题的战略高度的把握，以及手法的灵活务实，都给世人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让习近平距离实现中国统一梦更近了一步”

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的诸多细节都成为国际主流媒体关注的话题，如日本NHK新闻、美国《纽约时报》都关注习近平与马英九当天佩戴的领带颜色，日本NHK新闻还统计了双方的称呼，习近平称呼了两次“马先生”，马英九则称呼了四次“习先生”。此外，国际媒体还同时关注了习近平与马英九在闭门会面前发表的讲话，很多国际主流媒体稍后还纷纷转载两位领导人的讲话全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纽约时报》及《今日美国》等媒体在美国当地时间凌晨就更新了网页，以头条位置报道“习马会”，并配上二人握手的照片，其中《纽约时报》指出，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建立和平缔造者的形象，有助克服各方长久以来的分歧。报道指出，两岸均以“习马会”为推动和平及互利的契机，昨天是60多年来，双方领导人致力建立沟通基础的最重要时刻。《华盛顿邮报》的报道称，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领导人的首次会面。报道援引台湾网友的话称，“这是66年来最动人的一刻！子子孙孙都会为这一刻感到骄傲”。

彭博新闻社网站11月8日报道称，这次握手以及随后举行的闭门会谈是加强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最高潮。这让习近平距离实现中国统一梦更近了一步。11月7日的这次握手是他们在弥补分歧方面走得最近的一次。报道援引新加坡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助理教授胡江恩的话说：“这是一大突破，因为这次会面的真正影响是创造了先例。真正实质性的东西是他们见了面，握了手。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就可能有第二次。”

加拿大《星岛日报》当地时间7日社论称，习马从“面对面”，变成“肩并肩”，显示两岸领导人不但踏出历史性的一步，愿意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同时也建立进一步的互动关系，从个人的认识、了解，进一步产生互信，使得两岸关系推展到过去难以想象的新境界。

新加坡《联合早报》11月10日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题为《习马会与两岸关系的未来》的专栏文章称，“习马会”在新加坡成功落幕，从长远来看这次见面不仅仅是两岸关系的一个里程碑，而且如果两位领导人之间所达成的共识逐步得到实现，更会是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简单地说，“习马会”既是对两岸现状的界定和肯定，更是指明了两岸关系未来的方向和道路。“习马会”的核心是构建了一个两岸最高领导人的互动平台，为未来开创一种新的可能性。这种“有条件的可能性”为未来台湾领导人提供一个做理性选择的可能性。

英国BBC称，“习马会”的实质是以两岸领导人会面制度化来对抗“台独”，两岸之间长年的状态在逐步地发生改变。英国《金融时报》连续发表《“习马会”将巩固“九二共识”》和《“习马会”意味着什么》两篇文章，称两岸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的决定值得高度肯定，两岸关系正朝常规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此次会面将会进一步巩固“九二共识”。文章还援引新加坡前外长杨荣文的话称，此次会面将“开启中国历史和中华民族和平复兴的新篇章”。

“‘习马会’对全球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康奈尔大学学者卡尔森11月6日对法新社说：“‘习马会’不仅将对两岸关系、台湾政治产生重大影响，对中美关系也有深刻影响。”

《日本经济新闻》11月8日报道称，这次会谈不仅将扩大两岸间的交流，还可能给东亚经济一体化带来变化。7日的会谈再次印证了两岸关系对世界局势的重要性。新加坡《联合早报》也称，“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面不仅对两岸关系有极大影响，对于处理东北亚政治局势也会有启示作用”。韩联社11月8日以《应该以“习马会”作为他山之石》为题发表评论，认为韩国应该密切关注“习马会”对整个亚太形势可能带来的影响，特别是此前尽管韩朝达成了尽快举行政府间高级会谈的协议，但并未真正实现。韩国应该反思，能否从中学到如何将朝鲜拉回谈判桌的技巧。

《华尔街日报》引述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的话称，两岸在长期对峙后，双方领导人能够在和平并相互尊重下会谈，后冷战时期国际秩序应以此作为冲突管理模式的典范。俄罗斯《观点报》11月8日称，“习马会”对全球政治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整个太平洋地区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中国发展的速度和方式。此次会面，进一步拉近了两岸的关系。如果两岸能够十分接近的话，未来可能“永远不会有美国航母进入台湾海峡”。

日本《读卖新闻》11月8日引述“安倍身边人”的话则称，安倍对于两岸领导人会面后大陆和台湾的靠近一事，“真正是有强烈的关切和危机感。也认为有可能马英九为了恢复执政党的支持率而在‘对日共斗’上和中国大陆步调一致”。无论是东海还是南海，特别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主张对钓鱼岛的主权，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也有可能步调一致。日本共同社引述一些匿名官员的话称，日本政府打算“密切关注”此次会谈给亚洲安全及经济带来的影响。报道称，目前美中关系被认为因南海问题陷入紧张状态。有日本首相官邸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台湾地区偏向中国大陆，情况将会发生巨大变化。”

地方党政班子应充实金融人才

□ 徐鹏程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资本市场是金融的高端，随着经济新常态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新一轮经济变革悄然来临，最突出的表现是新兴产业、中小微创新创业企业成为实体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对金融和资本市场也更加依赖。对一个地方来说，金融活则经济活，金融兴则经济兴，金融在整个经济运作中的作用日益突显。要做好金融工作就离不开金融人才，纵观全国，无论是从省到地市，还是从地市到县乡，普遍缺少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中尤其迫切需要充实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干部。

地方公务员队伍中急缺各类金融人才

邓小平曾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要把金融搞好，就要把引进金融人才、金融资本摆到突出的位置。近年来，针对资本市场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上海、深圳等地不断拓宽视野，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创新金融人才聚集、才培养、发展、激励和流动机制，不断加强金融人才队伍建设。虽然如此，但从全国来看，各省市党政班子中金融人才的配备和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尚有很大的差距，一方面是大量的行政干部人浮于事，而另一方面却是党政班子中严重缺乏知识型和专家型的领导和干部，更缺乏具体的“操盘手”，尤其是缺乏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

金融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难以满足现实需要

金融人才的总量明显不足。金融业是知识和智力密集型产业，也是科技含量高、创新步伐快的产业，这就要更加重视人力资源开发，提高从业人员素质。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现已形成包括中央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在内的比较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以及多层次、多类型的金融市场主体，如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基本上实现了金融体系的多元化。然而，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发展历史，我国金融业人才的积累时间较短，人才占人口和人力资源的比例远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

金融人才结构性矛盾突出，表现为一般性人才过剩，高级人才短缺。目前，在金融机构中基础性人才基本上能满足需要，但缺少行业领军人才，缺少有海外实际工作能力、有多年金融混业的工作经验、熟悉海内外金融市场、有独到的分析研究能力的金融人才，金融工程、产品开发、风险合规、离岸金融、投行、航运保险等关键岗位的人才也很缺乏，远远满足不了金融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金融人才市场化配置机制不完善。城市金融人才的引进基本上形成了市场招聘、双向选择、择优录用的机制，城市金融人才流动较为畅通，这为吸引年轻的金融人才创造了条件。但集中表现在农村金融方面，金融机构进人就较多地延续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选任的范围不宽，方式比较单一，真正通过市场选聘金融人才还比较少，有些金融机构内部，传统的用工制度还没有完全被打破。

金融人才的整体素质还不高。目前，主要表现为具有计算机、国际金融、法律、外语、会计等知识和业务技能的专业人才数量不足；梯次性结构不尽合理的现实情况仍很严峻；各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奇货可居”，有金融混业经验、兼备金融法律、外语、产业背景等方面的“复合人才”更加稀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兴起，在这一个新兴领域中需要大量的既懂互联网还懂金融的人才，尤其需要集金融业务、网络信息技术、市场营销技巧、风控、法律、产品等多种知识技能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这种人才更是凤毛麟角；在人才队伍分布上，仍存在着地区、部门、专业间不够均衡的矛盾，适应新职能的专业人才严重不足的矛盾十分突出。

金融人才观念滞后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一是我国过于重视金融业务的开拓而忽视金融人才的培养，对人才的资金投入不够，没有充分发挥出人才资源开发在金融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和决定性作用；二是在人才衡量标准方面，过于看重学历、职称、资历和身份等外在要素，对品德、知识、能力和业绩等内在要素不够重视，还没有做到不拘一格选人才；三是相对于外资金融企业，国内金融机构中的人性化因素还比较少，以人为本的理念往往只停留在口号阶段，具体的执行措施很少，没能真正做到机构发展与个人发展的有机结合。

进一步充实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的金融人才

没有金融，就没有现代经济；不懂金融，就难以把握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规律，更难以驾驭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要发挥金融人才在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必须与时俱进，立足实际，改变金融人才特别是党政领导班子金融人才缺乏的局面。加强对金融人才队伍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综合协调，特别是在改善优化领导班子结构，选拔懂金融、经济等方面的高知识层次人才充实进入各级党政领导班子，解决能力结构的缺陷，提高领导班子整体功能，有效地发挥他们在金融和资本运作方面的聪明才智。

树立明确的领导班子建设目标。在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应按真正能为现代经济发展提供组织保证的要求配备专家型领导干部，其整个班子人员构成，必须配备具有较强的金融操作功能的人才，即在党政领导班子中增加金融副职职数。一般来说，各级党政领导班子都要求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战斗集体，其最终目标，就是更好更快地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在不能求全责备的条件下，某一方面弱一点是可以的，但在金融运作方面必须是要强有力的，否则，就不是一个结构合理的班子，特别是地市一级，更是如此。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应有1－2名副职是懂金融、懂资本运作的，这样才能突破经济发展中资金瓶颈的制约。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用人观念。努力创造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人才、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发展的良好环境，造就大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以便充实到党政领导班子中。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地方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要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就需要懂金融运作的人才，不懂金融运作的管理者领导地方发展经济，尽管身后有各种高参，但这都不能替代管理者个人的职业判断。懂市场运作的管理者领导地方，他们就能准确地理解和分析经济形势，不失时机地把握变幻莫测的市场前景，只要是遇到涉及市场的问题便可以很快地从市场的角度得到重视和解决，因为他们先摸透了、熟悉了市场规律，再加入政府领导班子，与单一的政工出身的政府组成人员形成互补，有利于优化领导班子结构。

具体的干部政策应适当向懂金融运作的管理人才倾斜。首先是要着眼于现有的情况，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要关注、发现金融人才，特别是在博士服务团中选取适合的人才，以优越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留住金融人才，给他们提供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要注意挖掘人才潜力，把那些学有所长，具有领导潜力的金融专业人才放到经济的主战场进行锻炼，一段时期后，再将其中优秀的选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此外，积极引进境外金融人才，从归国留学生和境外金融机构中聘请经验丰富、熟悉国际金融市场运作的人才，充实到地方党政领导班子中。并且要广开用人门路，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就能逐步培养一批懂金融的地方党政领导，利用他们国际化的视野和大手笔、大气魄的金融运作理念，使一个地方经济真正跨越发展。

完善金融人才队伍激励机制。改革地方金融机构高层次人才选拔任用方式。地方金融机构领导班子的选配实行聘任制，高层次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可以面向国内外公开招聘。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实行特聘专家制度，面向海内外选聘人才，尽快壮大金融人才队伍。探索建立地方党政班子与金融机构人才交流制度。有计划地选拔金融机构中层以上干部与市、县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相互交叉挂职任职。积极推动省、市、县政府和金融机构派员到金融机构总部挂职锻炼，增强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的沟通协调能力。同时，各级政府要结合实际，建立金融顾问制度，选聘省内外知名金融专家作为金融顾问，纳入专家智囊团，具体参与到政府的决策咨询、规划制定、人才培养、金融创新、项目论证等方面工作中。

参考与建议

社区党建与互联网怎么“+”

□ 朱 翊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必然极大地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互联网+党建”早已成为党建理论与实践创新的重要方向，党内教育、管理与服务都逐步在互联网上“飞”起来。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导向出发，从当前基层党组织开展共治与自治工作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社区基层党建与互联网怎么“+”？主要是五个方面。

“+”融合。越是基层，越要融合，在专业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现代化整合是制度创新的重要方面。点对点的结合，在效率上与互联网多点对多点的结合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通过简单的搜索功能，就能够在党建云平台上找到共建的契合点，这是网络在信息应用上的优势决定的。

“+”政务。比如，居民区党组织承担了大量超出了他们的职权范围和能力范围的事务，有时想要协调解决老百姓一件烦心事，那可真是“难”。再加上，居民需求量和参与度的增加，基层创新步伐的加快，党组织每年为了办好几个项目，往往说干嘴、跑断腿，开不完的会，忙于各种事务性工作中，甚至还需具备法律和财务审计上的能力。在社会自治力量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情况下，只有把党建与电子政务联系起来谋划，才能真正为基层党的建设释放出新的空间、新的活力。

“+”自治。当下政府管理推崇精细化，但只有自治才是真正的精细化。在英国的社区建设中，一开始也是由政府包揽，政府聘请专家设计的大项目，常常不能有效满足居民需要。面对政府失灵，居民开始自下而上开展小型项目。结果政府项目往往做不下去，居民项目却成为一种可持续性项目。“互联网+”如果能够助推社区自治，也将极大地提升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发挥。

“+”信用。基层党组织的公信力始终是第一位的，在这方面，互联网可以助力党务公开、党建监督工作。在基层党建工作中，涉及居民利益的事很多，比如评低保、选业委会主任、项目实施征求意见等，如果一开始就公开透明，甚至在移动平台上第一时间看、想看就看，则很多工作就更容易健康开展，透明本身就是群众工作方法之一。更值得关注的是，社区现在也有“利益群体”，也有“腐败”，这些问题已经成为了社区发展的“痛点”，甚至有“好人都不愿做业委会主任，做业委会主任的都有私利”这样的说法。其实，在商业领域也有类似的情况，原来装修、医疗、教育、出租等行业信用度不良、纠纷较多，现在通过“大数据”的支撑，也极大地改善了行业状况。

“+”引领。借助网络平台，党建项目的创意、结对、筹资、流程、台账都逐步自治化、信息化了，党组织就能归位做好总揽全局、项目认证和居间协调等工作，既为自治留下空间，也推进了党务工作的专业化转型。专业化的党建服务是什么？在社区里，基层党组织就是要发挥社会教育和价值引领的功能，比如通过网上朋友圈或党建群，不断将社区公约用生动活泼的形式扩散出去，发挥网络在信息传送方面的高效作用，争取获得更多群众的认同，为大家营造一种“公序良俗”的生活环境。

从实践中来